

中西方思维模式之比较

张启明

山东中医药大学

qmzhang@sducm.edu.cn

摘要 从原子论与元气论、机械分析与天人合一、单相概念与意象范畴、定量实验与直觉体悟、逻辑推理与比类取象五个方面论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提出“明确概念”、“整体模拟”、“实体分析”的中医学发展思路。

关键词: 中西方文化; 思维模式; 比较

举世公认,在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两大文化巨流是以华夏文化为主潮的东方文明和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的西方文明。这两大文明在数千年的漫长岁月中走着各自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各具风采的思维模式。认真分析和比较两种思维模式的差异,对于学习和研究中医学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中西思维模式之比较

1.1 原子论与元气论

在古希腊时期,人们也曾有类似东方人的那种有机整体的自然观念。如著名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570—前490年)把天体看作一个和谐的整体,认为万物都是数,和谐只能通过数的恰当比例才能达到。赫拉克利特(Heracitus)则认为“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并从整体出发,把“火”看作世界的本原。但这种整体观念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相反,西方人更加推崇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公元前460—前370年)的原子论:认为原子是虚空中的物质微粒,世界由原子组成,原子不可分割、永恒存在、本质相同、形态各异,运动是其基本属性。17世纪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伽桑狄(Pierre Gassendi,1592—1655年)再次提出原子假说,并运用于自然科学。嗣后,道尔顿(John Dalton,1766—1844年)和阿伏伽德罗(Amedee Avogadro,1776—1856年)建立原子—分子学说,使古原子论取得了精确和定量的形式。原子论一方面强调个体的间断性,习惯于从间断的个体出发推而广之,论及宏观世界的万事万物。故有人说,西方人的思维史主要是在完整的世界中寻找间断点的历史。另一方面,原子论强调事物的内部结构,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在的结构要素和构成途径,并从解剖事物的内部结构入手认识其本质。

在中国的传统思维中,“元气论”占据主导地位。“元气”是一种“流于天地之间”的连续的物质形态,“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没有形体,不可计量,故无从说明其内部结构和构成途径,只能从宏观整体上把握其性能。“元气”在永恒地运动中,首先“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分成天地两端,然后“天地合气,万物由生”,化生自然万物。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的思维史主要是从大千世界中探求其连续统一的历史。

总之,原子论强调客体的个体性、间断性、有形性、结构性和组合性,“元气论”注重事物的整体性、连续性、无形性、功能性和化生性。

1.2 机械分析与“天人合一”

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机械分析法逐步发展起来，代表著作如牛顿（Issac Newton,1642—1727年）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Laplace,1729—1827年）的《天体力学》、拉·梅特里（Julien de la Metrie,1709—1750年）的《人是机器》等。他们认为整体是其组成部分的简单代数和，是机械相加的整体，运动的原因是事物外部条件的改变。因而，一方面侧重于分析事物的各个细节，把统一的自然界划分为不同的领域，把一个研究对象离析为不同的部分，进而加以观察、实验，以对对象做出精确地描述。另一方面，将高层次的运动规律分解为较低层次的运动规律，用简单的运动形式解释复杂的运动形式，强调在整体层次下研究较小领域内的要素，从微观结构解释宏观现象。特别是牛顿，试图用力学原理解释一切，在近代科学发展史上曾一度出现了想把一切都归结为机械运动的狂热景象。

机械分析法使近代科学和技术得到了极为成功的发展。它对于弄清事物各组成部分的性质来说，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它强调的精确性、明晰度是科学研究中所必不可少的。正如恩格斯所言：“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

但由于它过分强调“分析”，不能科学地对待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作运动的东西；而是看作静止的东西；不是看作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作活的东西，而是看作死的东西。”（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8页）随着自然科学的一系列新发现（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细胞学和达尔文进化论），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就使这种传统的机械分析法走进了死胡同。

中国先秦文化是在以黄河、长江两大水系为中心的广大领域里孕育发展的。“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优越的地理环境加之封建思想的束缚，使人们逐渐养成了一种乐于耕种、随遇而安的心理习惯，不患贫而患不安，形成了追求安稳、和谐的心理特征。在与土地打交道的过程中，人们从原始古老的图腾崇拜转到了将自身与土地相混然的方面上来。不仅如此，还把人与整个自然混为一体，天人相依，精神与物质相容，逐步直觉到宇宙是一个整体，即“天人合一”的整体意识。

“天人合一”整体观萌芽于西周时期的天命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人格化了的神，是整个自然和社会的最高主宰，主张天、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通关系。“惟天阴鹭下民。-----天乃赐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尚书·洪范》）

春秋时期，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以及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深化，原始的“天人合一”论上升为一种世界观，并沿着两条不同路线发展：①按照人类自身的社会关系来塑造天，然后反过来强调人事的礼仪法则应以这种被塑造的天为最高依据。②把天看作是广阔无垠的大自然，强调人们行事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不可轻举妄动。

战国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不仅说过“唯天是大”，而且认为君子必须“知天命”，然后才可以“从心所欲不逾距”。而孟子更是儒家学派最明确提出完整意义“天人合一”思想的哲学家。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章》）又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也。”天的本质是“诚”，

是尽善尽美，而人的根本职责在于实现“天道”，因而作为君子就应“上下与天地同流”，把“天地”和“人”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一思想在《易传》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易之为易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易·系辞下》）所以，人可以“参天地，赞化育”，与天地并列为三。由此可见，从孔子到《易传》所要解决的都是天和人的问题，所要求索的都是有关“天人合一”的关系。

先秦道家学派比起儒家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认为“天”、“地”、“人”是统一的系列。“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庄子·天下》第三十三）这种“天人合一”整体思维模式发展到汉代，由董仲舒体现为神学目的论的天人感应观，认为天人相类相通，天能感应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进而主张运用某些宗教仪式以感动上天，促使其改变原来的安排。

时至宋代，几乎各派哲学家都遵循“天人合一”整体思维模式进行思考。张载把气看作是“天人合一”的基础，进而强调“合内外，乎物我，自见道之大端。”二程则从世界统一于理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把天人等同起来，“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二程遗书·卷五》）再如周敦颐、王夫之等无不以“天人合一”为立论依据。

“天人合一”整体思维模式，虽力图探索天人相通之处，以求天人的协调、和谐与一致，并把这种观点贯彻到世界观、认识论、社会历史、政治伦理等领域，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结构，不能对客体展开分析，因而不得不把思维重点落脚于客体的外部特征及与它物的关系上，且将事物的变化发展归之于内因（阴阳）的作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学派领导人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曾指出：“西方经典科学强调的是实体（如原子、分子、基本粒子、生物分子等），注意的是把对象分解为各种简单的要素来研究。中国传统的自然哲学强调的是“关系”，注意研究整体的协调和协作。”

1.3 单相概念与意象范畴

西方人倾向于把对象事物分解为简单要素、属性及其间单一关系来研究，因而作为思维工具的概念或范畴，常常是对对象事物的直接抽象和概括，意蕴大都是单一的、固定的。如实体范畴、属性范畴和关系范畴，均具有明确的内含和清晰的外延，并且一经确定，就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不容许有丝毫的游易与伸缩。

中国传统文化习惯于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予以考察，而整体显然蕴涵有多重属性和关系，这就意味着用单一意蕴的概念来表征对象世界简直是不可能的。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古人采用了以意象概念作为对象世界的象征以认识对象世界的方法。这种意象概念对于对象事物仅仅起着指示作用，故内涵极不确定，外延也无明确界限，同一意象概念常具有多重功能，表征不同的事物和对象的不同意义。例如“阴阳”既可代表水火、天地等相对客体，又可代表寒温、升降等事物的相对属性，还可代表某些事物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五行”即是实体范畴，代表木火土金水五种具体实物，又是属性范畴，“木曰曲直、火曰炎上、土爰稼穡、金曰从革、水曰润下”，还是关系范畴，表征分为五行的五类客体间的生克乘侮关系。

这种处理虽给语言表达带来许多方便，却常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含义模糊，难以把握。如“气”这一概念，既可指致病之邪气，又可指国家之元气，“几于随物可加”（严复）。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很难构建一个以概念为基础的严密的科学体系，且常因它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而消溶人们探求真理的努力。

造成单相概念与意象范畴不同的原因，还可能与中西方的语言文字有关。西方印欧语言是表音语言，是一维的时间性的，通过时间的延续来说明外部事物。其文字的形、声、义是统一的，见一字形即可读出其声，由其声即可认识其义，故常是信息的直接载体，依此文字为基础所形成的概念，多直接蕴涵着对象的意义。中国汉族语言是表意语言，是多维的空间性的。从展开的空间序列中摹拟或把握对象世界，可使人们根据文字的结构，做出种种想象，进行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联想。由于联想，同一个象意文字，便往往生出几种“意”来。由象意文字组成的意象概念自然常带有多重含义。

1.4 定量实验与直觉体悟

古希腊地处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及小亚细亚半岛西部海岸，丘陵纵横，土地贫瘠。恶劣的自然环境使人对大自然产生了恐怖心理，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表现为人与神、物质与精神的对立，迫使人们更加主动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战胜自然。故古希腊时代的哲学家大都是自然科学家。如米利都(Miletus)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Thales 约公元前 624—前 547 年)是希腊第一个天文学家、几何学家和物理学家。与米利都学派对立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也都是从事数学、谐音学、天文学、医学等的自然科学家。德谟克利特是“经验的自然科学家和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这一特质使他们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定量实验与实证分析。著名数学家欧几里德(Euclid, 生卒年月不详, 约鼎盛于公元前 300 年)在《几何原本》中创立的数学史上第一个公理化系统, 包括大量定义、公理、公设、命题、面积变换、以及对圆、多边形、相似形等的讨论, 比例论、数论、简单立体几何、求面积和体积等, 都是建立在广泛的实证与定量分析基础上的。英国思想家、新时代实验科学的创始人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 约 1214—1292 年)认为“离开数学, 自然就不可能被人认识”, “除非有实验方法的印证, 单凭推理得到的结论未必可靠。”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 年)则率先把科学实验和数学分析方法结合起来, 声称: “自然科学的书是用数学的方式写成的”。“哲学则是写在宇宙这本伟大的书中, 它一直打开在人们的眼前, 但要理解这本书就必须学会如何掌握写这本书所用的语言, 文字是三角形、圆形以及其它几何图形。没有这些, 人们连一个字也读不懂。”

近代科学以实验为基础, 把所研究的对象从复杂的环境中取出, 置于有条件的典型的环境之中, 使事物简化, 因而能更加深刻地揭示其某个侧面、某个层次的性质及运动规律。但因这一方法改变了客体的本来面目, 使所得结论常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在中国先秦的诸子中, 除了墨子、荀子、管子、惠施等少数几人在算学上间有心得外, 几乎没有一位是当时重要的数学家。相比之下, 他们更注重对事物“象”的认识。所谓“象”, 是从客体的现象、形象得来的, 关于事物的属性或相互关系的综合概括。《易传·系辞上》说: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 而拟诸其形容, 象其物宜, 是故谓之象。”如“水火者, 阴阳之征兆也”, 人们可以从水火认识阴的属性——寒凉、湿润、有形、晦暗、趋下, 阳的属性——温热、干燥、无形、明亮、上炎, 以及阴阳的对立统一关系这些“象”。

古人对“象”的把握, 是靠直觉体悟来完成的。所谓直觉体悟, 就是人脑基于有限的资料 and 事实, 调动一切已有的知识经验, 对客体的本质属性及其规律性联系做出迅速地识别、敏锐地洞察、直接地理解和整体地判断的思维过程。它不经过明显的中间推理就直接得出结论, 故主体不能明确地意识到它的行程, 也因之不能用言语将该过程和得出结论的原因清楚地表述出来。大有“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之感。

中国传统哲学之所以推崇直觉体悟, 与其突出哲学的道德功能(如封建道德践履)是分

不开的。古代圣贤强烈的从政意识和入世意向，及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哲学目的，必使其注重自身经验、突出思维主体，凭借直觉体悟仰观俯查、远取近取，统摄天下万物于思维之中。

直觉体悟虽最初与如何实现对“天道”的体悟，如何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如何达到对道德规范的自觉与自愿（即思维主体的道德修养、理想人格的确立）紧密相关，但在现代科学研究中，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由于客体纷繁复杂，影响因素多种多样，多种可能性同时并存，由于问题空间通常都是不明确的，所需的事实和证据也常常十分有限，更由于不存在一种凝固不变的逻辑通道引导我们解决问题。因此，人们在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时，常常会遇到不确定性，而在不确定性情景中，遵循严密逻辑规律，采取逐步推理方式是难以奏效的。相反，富于探索性的直觉体悟则可于此大显神通。借助直觉体悟，人们可在客观现实提供的各种可能性中做出适当选择，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做出有效地决策，在事实、证据有限的条件下做出准确的预见，在问题空间不明确的情形中迅速地找到解决问题的一般性原则和中介环节。大量事实表明，在科学创造活动中，直觉体悟在确定研究方向，选择有前途的研究课题，识别有希望的线索，预见事物的发展进程和研究工作的可能结果，提出假设，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领悟机遇的价值，在缺乏可供推理的事实时决定行动方案，在未获得决定性佐证时形成对新发现的想法等方面，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①由于直觉体悟常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进行，且不经过明确而严密的逻辑推理，故所得结论常带有一定程度的猜测性、预见性。②直觉体悟是在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上进行的，因此，由于人们在知识经验方面的差异，对同一事物或现象就可能存在不同的认知结果，出现通常所说的“见仁见智”现象。③直觉体悟常迅速自动进行，以至于主体对该过程所包含的各种心理活动没有清晰的意识，自然也就无法向他人说明思维的行程和结论形成的原因，带有很大的个体性。

1.5 逻辑推理与比类取象

所谓逻辑推理，就是指遵循严密的逻辑规则，通过逐步推理获得符合逻辑的正确答案或结论的思维方式。它进行的模式是阶梯式的，一次只前进一步，步骤明确，包含有一系列严密、连续的归纳或演绎过程。在其进行过程中，主体能充分地意识到过程所包含的知识与运算，并能用语言将该过程和得出结论的原因清楚地表达出来。

古希腊时代，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把抽象的逻辑理性作为认识和把握事物真理的最基本的手段，并把“逻辑学”视为一切科学的工具。这固然与他们的研究目的——探索世界的本原有关，更与哲学家们大都是自然科学家有关。因为数学、物理学（包括力学、天文学）、建筑学等都离不开高度抽象的逻辑思维方法，而这就使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在思考世界本原的时候，不能不习惯于这种抽象的逻辑理性。

被称为西方传统逻辑学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 348—前 322 年）提出逻辑思维三大基本定律（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确定的判断、定义及分类，三段论推理的主要形式与规律，以及阐释演绎法与归纳法的关系等等，直到今天仍是欧洲人值得骄傲的成就。

但在中国为了表述事物的“象”，古人常常用另一种与之跨度很大的事物的“象”作比喻（后一种“象”常常是人们比较了解的），使要说明的“象”与比喻的“象”（感性或理性上的）的共性，正是人们对要说明的“象”想表述的内容，此即所谓“比类取象”。

“比类取象”可使人们通过体会两种事物“象”的共性，使对比喻的“象”的理解，巧

妙地转移到对要说明的“象”上来。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可以在不说出被说明的“象”是什么的情况下，也能理解和把握其内涵。如“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设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神灭论》）以刃利喻形神，即使不说出后者是什么关系，也不影响人们对它的理解与把握。

《易经》、《老子》、《黄帝内经》等名著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长期成为经典，原因之一就在于其中明显的或隐含的比类取象达到了相当精辟的程度，足以表示中国传统哲学博大精深的内容。但正由于比类取象法不能直叙“象”的内涵，故自古以降，经、传、注、笺、义疏、正义、疏证、集注、训诂等不绝于文案。历代哲人遵循着“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规俗，案牒劳形，皓首穷经，日夜揣摩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和精蕴奥旨。趋于求同而怯于立异，最终常发展成为文化专制主义。

2 中西思维方式的未来发展趋势

以个体性为基点，以逻辑分析、精确论证为主的西方思维方式，曾经推动了自然科学的进步。可是，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出现了所谓“大科学”、“大技术”、“大工程”、“大教育”等等大系统。面对这些复杂的系统，那种把对象简单分割，再机械相加的思维方式，显然是大不适应了。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以其机械高速的验算能力和严格准确的逻辑证明能力，为人类认识的精确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同时，它又使人类认识的精确性和系统的复杂性的矛盾尖锐化，一个系统愈复杂，就愈难简单地依靠逻辑思维来认识。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弊端到近代也日趋明朗。由于它缺乏逻辑分析，仅停留在对自然界笼统、直观、模糊的认识上，因而不能科学地、具体地、精确地说明自然界的复杂变化发展。这就难怪近代自然科学革命未能在中国发生。

中西思维方式各自的片面性所造成的危机，促使人们不断地自发反省。中国人自近代起就向西方学习，而西方人也纷纷到东方来寻找智慧的灵感，呈现出中西思维方式合流的趋势。表现如下：

①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化，使人们开始注视中国古代的科学思维。在经历了近代几百年的分析之后，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开始实现高度综合，许多科学家开始注视中国科学思想，试图从中得到一些启发。一方面，许多现代综合科学的重要原理可以从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中找到自己的胚胎和萌芽。例如，著名丹麦物理学家玻尔（N.Bohr）就自称他的思想深深植根于东方文明之中。他曾受到阴阳学说的启发，在量子力学的理论研究中提出的及其重要的“互补原理”，从哲学上对测不准关系进行概括，并成功地揭示了微观世界的基本特征——波粒二象性。普利高津在访华讲演中说：“物理学正处于结束‘现实世界简单性’信念的阶段。人们应当在各个单元的相互作用中了解整体。要了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宏观尺度上组成整体的小单元怎样表现出一致的运动。这就要求修改已有的时间观，修改对自然法则的认识。这种新的思想发展和我从英国的李约瑟及法国的格拉耐的著作中了解到的中国的学术思想更为接近。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和。现代新科学的发展，近十年物理和数学的研究，如托姆的突变理论、重整化群、分支点理论等，都更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另一方面，中国一些传统科学思想也可在现代综合科学的基础上得到新的解释和阐发，获得新的生命力。例如，美国生物学家 Neison Goidberg 根据中国古代阴阳理论，提出了细胞和分子水平的生物控制“阴阳学说”，认为“第二信使学说”的环一

磷酸腺苷 (CAMP) 属阴, 磷酸鸟苷 (Gmp) 属阳, 两者是体内对立的双向调节系统。目前, 细胞水平的阴阳调节问题已成为医学界研究的一大热门。在加拿大还有人用现代科学语言, 将阴阳学说阐发为阴阳三定律, 并用物理学、化学、数学、原子结构、人体生理学, 特别是人体“内稳态调节”以及“人体半导体效应”等原理, 证明阴阳定律可以奠定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 获得新的生命形式。

②现代系统思维体现了中西思维方式的交叉与融合。从本世纪开始, 随着三论的产生和发展, 人类跨入了“系统时代”, 作为现代思维方式之一的现代系统思维, 突破了西方逻辑分析方法的局限性, 在考察对象时, 不是把整体分割成许多部分, 然后再机械的相加; 也不是先分析后综合, 从部分求整体, 而是从一开始就着眼于整体, 并从整体与部分, 整体与环境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中, 揭示和把握系统的本质特征和规律。现代系统思维也突破了传统综合方法的局限性, 在考察对象时不仅着眼于整体, 而且还非常注重对事物内部各要素的组织结构的分析, 并通过这种分析解释不同结构的事物的特定功能。可见, 现代系统思维从系统的整体出发, 把整体与部分、分析与综合、结构与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它舍弃了中西思维方式的短处, 发扬了他们的长处, 是中西思维方式在现代科技基础上融合的结果。

③现代科学模糊思维也体现了中西思维方式的合流。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迫切要求数学化、量化、精确化, 同时科学的深化又意味着研究的复杂化, 而复杂的东西本身又难以精确化。因此, 在科学技术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现代, 科学模糊思维成为现代思维的又一主要方式。现代科学模糊思维即是对中国古代直观、笼统、被动的模糊思维的否定, 又是对近代西方以定量分析为主的精确思维的否定, 但同时又包括了中西传统思维方式的长处。它是主体有意识地把对象之间的区分和界限加以模糊化处理, 然后抽出若干相对明晰的界限, 以达到对事物比较精确的认识。这种科学的模糊思维既包含了思维的精确性, 也包含了思维的模糊性, 在模糊中有精确, 在精确中有模糊。因此, 当人类认识的对象不再是简单的事物, 而是极为复杂的大系统、超大系统时, 追求片面的精确思维, 反而会导致认识上的模糊。而科学模糊思维能够帮助人们简洁明了地从整体把握对象, 节约信息传递过程, 使科学解释的逻辑过程大大简化, 这对于激发科学家的思维创造力和直觉能力, 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在精确思维无能为力的地方, 科学模糊思维却可以起意想不到的作用。可见, 现代科学模糊思维从复杂的系统客体出发, 把定性定量、精确与模糊、逻辑与直觉有机地结合起来, 乃是中西思维方式合流的最好体现。

3 中医学的发展思路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成果, 中医的思维方式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特点, 故以现代科学为工具, 取长补短是其发展的必由之路:

明确概念 将中医学中的意象概念进行综合分析, 按其所指是实体、属性或关系之不同情形分别定义, 使具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如认真分析“阴阳”的含义可知, 中医学中的阴阳, 是关于事物的属性和对立统一关系的概括, 故可将阴定义为寒凉、湿润、晦暗、下降、收缩等属性的集合, 阳定义为温热、干燥、明亮、上升、扩张等属性的集合, 阴阳定义为阴、阳两集合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整体模拟 中医学在“天人合一”整体思想指导下, 凭借直觉体悟, 曾在生理、病理、疾病诊治方法等方面产生了许多深刻的认知结果, 且千百年来用以指导临床实践确实行之有效, 故不妨先将其作为正确的已知条件来认识。在此基础上, 若能在连续的关系场中, 借助现代科学的整体模拟技术及现代西医学的有关认识, 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 找到各已知条件

间的必然联系，且获得的新结论能验证于临床，则能确切说明原已知条件的正确性，使中医理论向量化、严密化方向发展。

实体分析 中西医学的研究对象是共同的，故中医脏腑的物质基础必不外于西医学的组织器官。只有沿着脏象学说形成的原始思路，采用整体模拟方式，寻找脏腑的解剖学实质，进行实体分析，才能使中医避免直觉体悟带来的猜测性，真正走向定量实验的轨道。

参考文献

- 1 陈喜乐. 中西思维方式之比较. 逻辑, 1992, 1 (2)
- 2 范明生. 东西思维模式初探. 逻辑, 1993, 7 (2)
- 3 魏博辉. 有机论哲学与机械论传统. 新华文摘, 1988, 1 (32)
- 4 傅季重. 中国传统思维探源. 逻辑, 1993, 8 (35)
- 5 王金华. 试论比喻推理. 逻辑, 1992, 7 (38)